

# 時空之間：關於地理學想像的省思<sup>1</sup>

## Between Space and Time: Reflections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王志弘譯

Harvey, David (1990) "Between space and time: reflections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0(3): 418-434.

### 摘要

雖然空間與時間的概念是被社會地建構起來的，但它們與客觀事實的全體力量一同運作，並且在社會再生產的過程裡扮演了關鍵角色。因此，無可避免地，空間與時間概念會做為社會變遷過程裡的重要部份而涉入爭辯，不論這種變遷是由外界附加的（如帝國主義的支配），或是由內部產生（如環境主義和經濟的決策標準之間的衝突）。空間與時間概念的歷史地理學研究，指出這些概念的社會建構，乃是根植在生產模式，以及具此生產模式特徵的社會關係之中。尤其是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革命性質——以強大的技術變遷趨勢和快速的經濟成長與發展為標記——也曾與空間和時間的社會性概念之鉅大革命有所關連。這些革命的意涵，例如所謂的「以時間消滅空間」（annihilation of space by time），以及普遍性的資本周轉時間加速，都將在文化、政治和美學理論的領域裡予以追索。最後，回到地理學這門學科，將它視為一個問題與刺激，反省當代社會生活中，地理學想像的角色。

關鍵詞：美學、資本主義、地理學、地緣政治、歷史唯物論、地方、社會變遷、社會再生產、社會空間、社會理論、社會時間

---

<sup>1</sup> 這是在美國地理學家協會年會中，對全體成員發表的演說稿的修訂版本，時為 1989 年 3 月 21 日，於馬里蘭州巴爾的摩。

我想要考量的問題，是建構一個關於空間與時間的歷史地理學。由於這聽起來像是（也的確是）對空間和時間概念的雙殺，這個觀念必須先作些說明。其後，我將把這個觀念跟日常生活的歷史地理學，以及那些自稱地理學家的人的社會實踐關連起來，並探究它的含意。

## 社會生活的空間與時間

涂爾幹（Durkheim, 1915）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裡指出空間與時間是社會構造物（social construct）。人類學家的作品，諸如哈洛威（Hallowell, 1955）、李維史陀（Lévi-Strauss, 1963）、霍爾（Hall, 1966），以及晚近的布迪厄（Bourdieu, 1977）和莫爾（Moore, 1986）都確證了這個說法：不同的社會製造了性質有所差別的空間與時間概念（亦見 Tuan, 1977）。爲了闡釋這個人類學證據，我要強調兩點特質。

首先，空間與時間的社會定義，跟任何個人和制度皆須回應的客觀事實的全體力量一起運作。例如，在現代社會裡，我們接受時鐘時間做爲日常生活的客觀事實，即使這種時間是社會構造物；它提供了共同遵循的標準，不受任何個人的影響，我們不斷參照它來組織自己的生活，並且用它來評估與判斷各種社會行爲和主觀感覺。甚至當我們不遵循時鐘時間的時候，我們也深知我們不遵循的是什麼。

其次，客觀空間與時間的定義，深深糾結在社會再生產的過程之中。例如，布迪厄（1977）用北非卡拜爾（Kabyle）的例子，說明了時間與空間的組織（曆法、住屋內的分隔等），藉著指派人群與活動到不同的地方與時間，而有助於建構社會秩序。群體對應著特定的空間與時間的組織模式，來統整其階層、性別角色和分工。例如卡拜爾社會裡的女性角色，是以特定時間裡所佔有的空間來界定。空間與時間的特殊呈現方式，引導了空間的與時間的實踐，進一步又確保了社會秩序。

這種實踐對先進資本主義社會並不陌生。首先，空間與時間一直是個別化與社會分化的基本手段。將空間單位界定爲行政的、法律的或會計的項目，便定義了對於社會生活有廣泛衝擊的社會行動領域。的確，替地理實體命名的這個動作，便意涵了凌越其上的權力，尤其是關於這些地方、居民及其社會功能被呈現的方式的權力。誠如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 1978）在其東方主義研究裡的精妙闡述所示：各色各樣民族的認同，可以被外來者藉著所賦予名號裡的含意與聯想所瓦解、形塑與操弄。這種地方和認同的再現（representation）的意義與方式，牽涉了非常多的意識形態鬥爭。不過，在僅僅是指認（identification）的動作之上與之外，在某個社會－空間結構裡，對地方的指派還指明了不同的角色、行動的範疇，以及在這個社會秩序中接近權力的途徑。不同的社會活動，以及不同的關連方式的時刻（when）與地點（where），傳達了清楚的社會訊息。例

如，我們依然教導孩童「任何事物都有定時定點」的觀念，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裡（雖然我們覺得這個位置是否舒適是另一回事）。再者，我們都知道被「安頓在位置上」（put in one's place）是什麼意思，而且實質地與社會地挑戰這個位置，都形同對社會秩序裡很根本的某些東西提出挑戰。靜坐、街頭示威、巴士底監獄（Bastille）或德黑蘭（Teheran）美國大使館門前的怒潮、柏林圍牆倒塌，以及佔領工廠或大學行政大樓，全都是攻擊既存社會秩序的信號。

空間與時間的概念在社會再生產中運作的確實方式如此微妙多樣，若欲加以正確解讀，需要使用我們所能運用的最複雜探究工具，然而，對這些現象的解釋已經很多，對其普遍性做進一步的證明乃屬多餘。堅實的證據可以支持下述命題：每個社會形構都建構客觀的空間與時間概念，以符合物質與社會再生產的需求和目的，並且根據這些概念來組織物質實踐（material practice）。

但是，社會會變化與成長，它們由內部轉變，並且適應外來的壓力與影響。客觀的空間與時間概念必須改變，以容納社會再生產的新物質實踐。公共的與客觀的時空概念的這種轉移是如何達成的呢？在某些情況裡，答案很簡單。藉由征服、帝國主義擴張或新殖民支配，列強便安置了新的空間與時間概念。例如，歐洲向北美洲移民，把十分陌生的時空概念加諸平原印第安人，並因此永遠改變了這些部族（如果能夠的話）在其間從事（take place）再生產的社會架構。米切爾（Mitchell, 1988）指出，十九世紀晚期將埃及帶入歐洲資本主義規訓體制（disciplinary frameworks）的計劃，其核心乃是在房舍、教室、村莊、軍營，甚至開羅城本身，安放數學理性的空間秩序。這些強加的秩序，不必然會被全盤接受。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擴展，時常引起猛烈的戰鬥，將不同的民族予以社會化，進入內含在工業組織裡的共同時間規訓網中，而且尊重以數學精確記述的領域區劃和土地權利（Sack, 1986）。雖然抵抗這種強加概念的行動很多，當代世界裡公共的時空定義，大都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裡定型的。

對時間與空間的公眾感受，在遭遇來自內部的挑戰時，引發了更有趣的問題。當代社會的這種爭執，部份源於對時鐘權威與地籍圖（cadastral map）專制的個別的和主觀的抵抗。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文學與繪畫中，充滿了反抗空間與時間的簡單數學和物質測量的跡象，心理學家與社會學家則在研究後發現，一個高度複雜且經常混淆不清的個人與社會的再現世界，跟支配性的公共實踐大異其趣。個人的空間與時間感受，不會自動就跟公共的感受一致，如塔馬拉·哈利芬（Tamara Hareven, 1982）的說明，經由一套複雜的方式，「家庭時間」能夠與「工業時間」整合，並且彌補後者的勞動力去技術和再技術化，以及循環的就業模式帶來的壓力。更為顯著的是時空概念中，階級、性別、文化、宗教和政治上的分化，經常成為社會衝突的場域。在這種鬥爭裡，會出現什麼是一切事物的正確時間與空間，以及什麼是空間與時間的適當客觀性質的新定義。

某些這類衝突的例子依序而來。第一個例子出自《資本論》關於「工作日」

的章節，此處（1967:233-35）馬克思假想了一場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對話。前者堅持公平的一日工作量，須以一個工人次日能回來工作所需的恢復體力時間來衡量，而公平的一日工資，則是足夠抵付每日再生產成本的金錢。工人的回答是：這種計算忽略了不間斷的苦勞所致的壽命縮減，而且以整個勞動生涯為準來計算的話，公平的每日工作量與工資就大不相同了。馬克思認為，由市場交換法則的立場來看，兩邊都沒錯，但是不同的階級觀點說出了社會計算的不同時間範域（time horizon）。馬克思認為在這種同等權利之間，決定勝負的是力量的大小。

「父親時間」(Father Time)的產生是第二個例子。由於將勞動時間(working time)定義為只是直接售予他人的那部份的奇特習慣，使得時間隨性別角色而有十分不同的解釋。而且，如弗曼(Foreman, 1989)指出的，把女性的世界化約成自然的循環時間(cyclical time)，具有將女性排除在父權歷史的線性時間(linear time)之外的效果，使得女性成為「男性定義時間的世界中的陌生人」。這個例子中的鬥爭，乃是挑戰神話、圖像和儀式的傳統世界，其中男性對時間的支配平比於對自然的支配，以及對女性做為「自然物」(natural being)的支配。例如，當布列克(Blake)堅持「時間和空間是真實的存在(real being)，時間是男人，空間是女人，而她的男性部份是死亡」(引自Foreman, p.4)時，他所接連的是一個廣佈的寓言式預設，到今日都回聲不絕。依弗曼的看法，無法將誕生（及其所有寓意）的時刻接連上男性對於死亡和歷史的專注，乃是男女之間的深層心理戰場之一。

第三個例子引自一位經濟學家和一位地質學家有關礦產資源開採的最佳時間範域的對話。前者主張適宜的時間範域應按照利率和市場價格而定，但地質學家則堅持非常不同的時間概念，認為每一代都有責任留下足夠的資源給後代。沒有合乎邏輯的方法能解決這個難題，它也只能以力量來解決。資本主義中盛行的支配性市場體制，以利率來決定時間範域，而且幾乎在所有經濟計算的領域裡(包括以抵押貸款購屋)，這都是故事的結局。

我們在這裡指出了社會衝突的潛能，它完全來自決策效果據以運作的時間範域。經濟學家通常接受凱因斯的箴言：「長久以後，我們都已死去」，認為經濟與政治決策可以操作的合理時間範域是短期的(short-run)，環境主義者卻堅持必須在無限的、所有生命形式(包括人類)都需保存的時間範域裡衡量責任。此處時間感受之間的對立很明顯。即使皮古(Pigou)經濟學在經濟計算裡引入較長的時間範域，實際的計算方法仍是以經濟而非以生態、宗教或社會計算來訂定的貼現率(例如皮爾斯等人[Pearce, Markandya and Barbier, 1989]在《綠色經濟學藍圖》中的報告，主張所有的環境衝擊皆可以金錢計量，貼現率則是考量長期環境衝擊的完美手段)。發展與變遷的整條政治-經濟軌跡，乃視我們在社會實踐裡採用哪種客觀定義而定。如果實踐是資本主義式的，那麼時間範域就不可能是環境主義者執守的那種。

在實質的與概念的領域裡，空間的慣例與定義，同樣也是爭執的所在。此處

環境主義者也傾向於使用遠較為寬廣的社會行動的空間範圍，關注地方活動的流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s），它造成影響全球升溫、酸雨，以及掠奪資源基礎的使用模式。這種空間概念，跟在土地價格和利率限定的時間範域內，以特定位址的地租極大化為目標的決策互相衝突。使環境運動別樹一幟（同時在許多方面使它如此特別且有趣）的，正是它據以對待社會再生產與組織問題的時空概念。關於空間和時間的意義與社會定義的這種深刻鬥爭，很少直接顯現。它們通常從佔有與支配特定時空的較直接鬥爭中浮顯出來。例如，我費了好幾年才明白，為什麼巴黎公社成員在 1871 年革命時，把保衛巴黎的緊迫組織工作放在一邊，而立刻拆毀凡杜梅柱（Vendôme column）。這根受憎恨的圓柱，象徵長久以來統治他們的外力；它是城市空間組織的象徵，藉由奧斯曼（Haussmann）所建的林蔭大道，將勞工階級驅離市中心，這個空間組織把許多人口安置在「他們的位置上」。賀斯曼在城市的系絡上置入全新的空間概念，那是一個與基於資本主義（特別是金融）價值的新社會秩序相稱的概念。1871 年革命面對社會關係與日常生活的轉變，導致（或者公社成員覺得該如此）採用不同以往的非層級性意象，來重建巴黎的內部空間。這種衝動是如此迫切，以至於推倒凡杜梅柱的公共場景，成了公社宣示對城市空間的權力時的激化時刻（Ross, 1988）。公社成員不僅佔領他們曾經被粗暴地趕走的空間，也企圖以非層級和公社式的意象，來重塑都市空間本身的客觀社會性質，試圖藉此建立另一種社會秩序。後來重建這根圓柱，乃是一個反動的訊號，就如同在蒙馬特（Montmartre）的高處建立聖心堂（Basilica of Sacré Coeur），替所謂公社的過錯贖罪一般（見 Harvey, 1985）。

美國地理學家協會 1989 的年會在巴爾的摩（Baltimore）召開，對於在此地住了十八年的我而言，這兒也是一個異化的地區。目前內港（inner harbor）再開發的嘉年華會，掩蓋了關於這處空間的長遠鬥爭史。1960 年代早期開始的都市更新，是由地產開發商和金融機構領頭，企圖再殖民他們認為具有策略性地位但正在衰頹的市中心。但是他們的努力受到 1960 年代騷動的阻礙，市區充滿了反戰示威和反文化事件，最令投資者喪失信心的，是大部份發生在貧困非裔美國人地區的街頭暴動。內城是一個充斥不滿與社會分裂的空間。然而，在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遭暗殺引發的暴力浪潮撼動本市之際，一個同盟出現了，企圖恢復一致團結與對這座城市的歸屬感。這個同盟包容廣泛：它包括教會（特別是黑人牧師聯盟）、各種社區領袖、學院和市區律師、政客、工會份子、官員，以及殿後的商業社團（他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這次鬥爭試圖將這座城市重整為一個連帶緊密的社會實體，成為對種族與社會不公十分敏感的工作與生活社區。

在這次努力中出現了一個想法：在內城創辦商展市集，慶祝基於本市之多樣宗教、族群和種族組成的「他異性」（otherness）與差異，同時讚頌在這種歧異性中仍保有的市民團結。1970 年舉辦第一次商展，在周末帶來廿五萬人潮，從本市的各個鄰里來到內城充斥不滿的空間。到了 1973 年，將近兩百萬人光臨，內港再度被尋常百姓以 1960 年代無從想見的方式佔領了。它成為在差異中肯定

社區和諧的地點。

1970 年代，雖然有不少群眾抗爭，但是商業主義和地產開發商的力量再次俘獲這個空間。它變成公私合夥的地點，大量公款被私人而非市民利益所吸收。凱悅－攝政飯店，美國地理學家協會會議的總部，耗費了五百萬私人資金，一千萬都市開發行動補助金，以及一個市府投資於基礎建設和房屋結構的複雜協議所發行的大約二千萬公債。內城空間成了一個炫耀性消費的空間，頌揚商品而非市民價值。它成爲一個「奇觀」(spectacle) 地點，人在其中不再是佔用空間的積極參與者，而被化約爲一個被動的觀賞者 (Debord, 1983)。這種奇觀使得注意力離開城市其餘部份可怕的貧窮景況，投射出成功與活力的意象，而現實卻是嚴重的貧困與無力 (Levine, 1987)。當所有金錢都傾入內城從事再開發之際，城市其餘部份只得到一點點錢，有時還損失慘重，於是在敗壞的汪洋之中創造了一個豐裕的市區孤島 (Szanton, 1986)。燦爛的內港轉移了對巴爾的摩其他地區正在聚積的不公不義的眼光，這些不公不義現在已安全地 (或看起來安全地) 被遮掩在看不見的絕望鄰里裡頭。

這些例子的重點是要說明，當社會空間在某個社會形構的軌跡中遭遇競爭時，它如何獲得新的定義和意義。在巴黎和巴爾的摩，我們都見到了爭取具策略性的中心城市空間之控制權的鬥爭，這是更廣大的以利用平等和正義爲形象建構起來的社會空間，來取代階層與純粹金錢權力之地景的鬥爭的一部份。雖然兩者都沒有成功，它們卻也顯示了對於社會空間 (和時間) 的支配性與霸權的界定，永遠都會遭受挑戰，因而總是有改變的可能。

### 空間與時間之歷史地理學的唯物論觀點

如果空間和時間是社會的和客觀的，那麼就能推知社會過程 (包括前面談到的社會衝突) 在時空的客觀化裡扮演了一個角色。既然如此，我們應該從何處著手，來研究社會空間和時間在不同的歷史與地理脈絡中被塑造的方式呢？這個問題的答案離不開我們所抱持的存有論和認識論的鮮明特質。眾所皆知，我的立場顯然是馬克思主義，也就是所有探究都依照歷史地理學的唯物論的基本原則來開展。客觀的定義首先要以對社會再生產的物質過程的研究來理解，而非訴諸思想與觀念的世界 (雖然這方面的研究也有貢獻)。像史密斯 (Smith, 1984:77) 所說的：「空間的相對性不是一個哲學議題，而是社會與歷史實踐的產物。」

讓我說明一下這種運作中的原則。我常常要地理學的新生想一想他們的上一餐是哪裡來的。回溯這一餐所用的每一樣材料，會顯露出一種依賴關係，依賴一個在許多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社會關係與生產條件下從事社會勞動的世界。如果把用來製造我們直接消費的東西的那些原料也列入考量，這種依賴就延展得更遠了。但是，即使我們實際上對鑲嵌在把食物擺上我們餐桌的系統中的那些複雜生產地理和無數社會關係一無所知，還是照樣可以吃掉我們的食物。

這正是馬克思（1967:71-83）在發展他最有力的概念之一商品拜物教（fetishism of commodities）時所處理的狀況。他想要用這個詞語來捕捉市場遮掩社會（以及，我們應該加上地理）的訊息和關係的方式。我們無法僅僅看著商品，就能分辨出它是由義大利合作社的快樂勞工生產的，或是由南美洲在被隔離的情況下，遭受嚴重剝削的勞工生產的，還是由瑞典受到適當的勞動法與工資協議保護的受薪勞工所生產的。超級市場貨架上的葡萄不會說話；我們看不到上面的剝削指紋，也不能立刻指出它們來自哪裡。藉由進一步的探究，我們就能揭去披在地理與社會的矇昧之上的面紗，讓我們警覺到其中的問題（就好像我們參與對非工會的或南美洲葡萄的消費者抵制時所做的一樣）。但是這樣做的時候，我們發現必須走到市場所顯示的現象之後與之外，才能理解社會是怎麼運作的。這就是馬克思要做的工作。我們必須走到面紗、市場的拜物教和商品背後，以便把社會再生產的完整故事說出來。

從商品拜物教引發出來的地理無知本身，就是關切的緣由。我們在市場拿取商品的個人經驗的空間範圍，跟商品被製造出來的空間範圍沒有關係。這兩種空間領域十分不同，而且站在前一種立場所做的決定，由後者看來不一定適當。在了解空間和時間的歷史地理時，我們應該採用哪一種經驗呢？嚴格說來，我的答案是兩者都要，因為兩者同樣是物質的。但是在這裡，我堅持我們應該運用馬克思拜物教概念的全部力量。如果我們把個人經驗的領域（在超級市場採購、通勤上班，以及到銀行提款）當做全部，那麼我們就會落入對世界（包括對空間與時間的客觀社會定義）的拜物教式詮釋。個人的經驗是真的、也是物質性的，但是它們的組織方式會掩蓋其他的空間與時間定義，而這些定義乃是依據商品生產和資本積累的要求，經由市場的訂價而形成的。

對於我們自身日常再生產之物質基礎的單純關心，必須納入一個可操作的知識，這種知識關係了商品生產的地理學和鑲嵌在商品生產與資本循環中的時空定義。但是，實際上大部份人卻沒有這種知識。這也引發了重要的道德議題。例如，如果我們認為，對那些有功於把食物擺上餐桌的人展現道德關懷乃是正確且適宜的，這就意味著道德責任已經延伸到涵蓋互相交錯的市場的整體複雜地理和社會往來了。我們不能理直氣壯地在星期天上教堂，慷慨捐款給幫助教區窮人的基金，然後又無知地走入市場，購買種族隔離地區生產的葡萄。我們也不能理直氣壯地要求鄰里環境品質，同時堅持要生活在必然會污染其他地區空氣的水平上（基本上這是生態學者的論點）。我們的問題所在，確實正是馬克思要指引我們的。我們必須穿透拜物教的面紗（由於商品生產和交換體系的緣故，這層紗必然圍繞著我們），並發掘後面藏了些什麼。我們特別是要知道這些每天給我們麵包的物質過程，怎麼樣定義了空間和時間。現在，我就來談談上述的世界。

### 資本主義時代空間與時間的歷史地理學

對西方資本主義時代時空之歷史地理學的考量，顯示了有關空間和時間的概

念與實踐，都隨著政治－經濟的實踐一同變化。勒高夫（Le Goff, 1980, 1988）指出，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的轉變，引發了時空概念根本性的重新界定，這有助於根據新社會原則來重整世界秩序。小時是十三世紀的發明，分與秒則遲至十七世紀才成為通用的量度標準。雖然這些量度標準最早是源自宗教（揭顯了猶太－基督教的世界觀和資本主義興起之間深沈的連續性），適當的計時量度的傳佈，與生產、交換、商業和管理的效率要求，有莫大的關連。那是一個以都市為基礎的，「心靈結構及其物質表現」的革命，而且根據勒高夫（1980, 36）的說法，它「深深地糾結在階級鬥爭的機制裡」。蘭蒂斯（Landes, 1983, 78）斷言，在城市裡「均等的小時宣告了新的文化和經濟秩序的勝利」。但是這場勝利是部份且孤立的，至少直到十九世紀中期，西方世界大部份地區都尚未受到波及。

和計時的歷史一樣，在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的轉變裡，製圖學的歷史，大致上涉及了根據清楚界定的數學原理，來改良空間的測量和再現。此處貿易和商業、財產和（封建世界無法認知的那種）領地權利的利益，在重塑心靈結構和物質實踐時，也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地理知識做為軍事和經濟權力的重要資源日益顯明時，如蘭蒂斯（1983, 110）所示，地圖和金錢之間的關係也相距不遠了。一四〇〇年托勒密（Ptolemy）的地圖傳入佛羅倫斯（Florence），立即被用來做為描繪地理空間和儲存地區資訊的工具，如我們現在所知的，這乃是地理學知識建構裡的一項根本突破。此後，原則上已經可能將世界理解成全球性的整體了。

這個製圖學革命的政治意涵，值得注意。比如說，理性的數學空間與時間概念，是政治平等和社會進步的啓蒙主張的必要條件。法國大革命的國民會議的首要行動之一，是下令有系統地製作法國地圖，做為確保政治代表之平等的工具。在世界的民主體制裡，這是一個如此熟悉的憲政議題（伴隨了政黨為私利改劃選區的歷史），以至於民主和理性的地圖製作之間的密切關係，已經被視為理所當然。但是想像一下，僅憑著世界地圖（Mappa Mundi）就想要完成一個平等的代表系統是怎麼一回事。傑佛遜（Jefferson）的土地系統，以其依然支配著美國地景的重覆數學格網，也在尋求理性的空間分化方式，以便促進土地均分式民主的形成。實際上，這對資本主義的空間佔用和投機已證明是極大的助益，和傑佛遜的目標恰巧相反，不過這也顯示了客觀的社會空間的特殊定義（這個例子裡是以嚴格的理性主義啓蒙語調來解說的），怎麼樣促使一種新社會秩序的興起。

勒高夫和蘭蒂斯所提出的這種解釋，無可置疑地說明了時空概念和相關的實踐，在人類的事務裡，絕非是社會中立的。正是因為這種政治和經濟的意蘊，空間和時間的意義依然是爭論多端，而且是比我們願意承認的還要嚴重的問題。例如黑格森（Helgerson, 1986）指出，英國的文藝復興地圖製作（由史匹德〔Speed〕、諾頓〔Norden〕、卡斯敦〔Caxton〕以及其他人士製作）、對抗王朝特權的戰鬥，以及後者最後被個人和國家的關係在其中具有支配性的政制所取代，這些事情之間有所關連。黑格森的論點是新的製圖表現法，使個人得以用比較接近這些新的政治和社會定義的方式來看待自己。拿一個更晚近的例子來說，在殖民時期，殖民

行政的地圖具有非常特殊的性質，反映了它們的社會目的（Stone, 1988）。

由於我在其他地方已經談過上述主題（Harvey, 1985, 1989a），我在這裡只是要確認關於空間和時間之新心靈概念的建構和物質實踐，在資本主義興起成爲一種特殊的社會經濟體系裡，具有根本的地位。這些概念和實踐總是部份的（雖然隨著資本主義的進展，它們也變得更具支配性），而且在任何情況裡，它們都陷入特定地方和時間的社會爭辯中。但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再生產，需要這些概念和實踐同時扎根在觀念的世界和社會實踐的領域裡。

然而，資本主義是一個革命性的生產模式，總是不停地尋找新的組織形式、新的技術、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新的生產與剝削形態。資本主義在其時間和空間的客觀社會定義上，也是革命性的。的確，和幾乎一切其他創新的形式比較之下，空間關係與空間再現的激烈重組，具有格外有力的效果。收稅公路和運河、鐵路、汽船和電報、收音機與汽車、貨櫃化運輸、飛航貨運、電視和電子通訊，這些事物改變了時空關係，逼使我們進入了新的物質實踐和新的空間再現模式。測量和分劃時間的能力也經歷了革命，首先是日益精確的計時器的生產和傳佈，其次是密切關注生產的速度和調合機制（自動化、機械人化），以及貨物、人群、資訊、訊息等等的移動速度。客觀的空間和時間的物質基礎，已經成爲人類事務中快速移動而非固定的資料點。

爲什麼會有這種移動？由於我已經在其他地方很仔細地探究它的根源（Harvey, 1982, 1989a），這裡我只概述主要的論點。時間是資本主義裡的重要量度，因爲社會勞動時間乃是價值的衡量標準，而剩餘社會勞動時間則位居利潤來源的核心。再者，資本的周轉時間很重要，因爲加速（生產、行銷、資本周轉）是個別資本家擴大利潤的有力競爭手段。在經濟危機和競爭特別激烈的時刻，周轉時間比較快的資本家，比對手更能存活下來，其結果是典型的社會時間範域縮短了，工作與生活的強度升高，而變遷的步調加快了。同樣的命題也可以運用到空間的經驗。空間阻礙的減除和「藉由時間來消除空間」的鬥爭，對於資本積累的整體動態非常要緊，而且在資本過度積累的危機中格外明顯。藉著進入新地盤的地理擴張和一組全新的空間關係的建構，來吸收資本（有時是勞動力）的剩餘，已經不是少見的事。空間關係和全球空間經濟的建構與再建構，如昂希·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 1974）的敏銳觀察，乃是使資本主義能夠存活到二十世紀的主要手段。

這種結果下的空間與時間的歷史地理學的一般特徵（相較於地點、時間與原因的詳情），不是意外或任意的，而是內藏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運動法則裡。一般的趨勢是朝向周轉時間的加速（生產、交換和消費的世界都傾向於變得更快）和空間範域的縮減。以通俗的話說，我們或許可以說托夫勒（Toffler, 1970）的「未來的衝擊」遇上了馬歇·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 1966）的「地球村」。這種時間和空間的客觀社會性質的周期性革命，並非沒有矛盾。例如，必須有長期而且通常是高成本的緩慢周轉時間的固定資本投資（像電腦硬體），才能加快其

他資本的周轉時間，而且要生產特定的空間關係（像鐵路網），才能藉由時間來消除空間。因此，時間與空間關係的革命，經常不僅導致建立在先前時空系統周遭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實踐的毀壞，也會導致嵌在地景裡的實質資產的廣泛的「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最近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歷史，充份地示明了我心裡所想的這個過程。

馬克思主義的資本積累理論，提供了理論性的洞見，來觀照西方資本主義空間和時間的面向性（dimensionality）裡發生的矛盾變化。如果，像目前的狀況一樣，當代華爾街（Wall Street）的時空世界和十九世紀股票交易所非常不同，而且兩者都和法國鄉村（當時與現在），或者蘇格蘭小農場（當時與現在）很不一樣，那麼這就要理解成一組對普遍的聚合條件的特定回應，而這種條件是由商品生產和資本積累的法則所塑造的。我想要檢視的正是其中所隱含的矛盾與緊張。

### 空間與時間面向性之變化的文化與政治回應

社會空間與時間的客觀性質的快速變化，令人混亂不安，這正是因為它們關於社會秩序的革命性意涵，非常難以預測。一八三九年的《每季評論》（*Quarterly Review*）十分生動地捕捉了這種令人神經緊張的懸疑：

假想我們的鐵路，即使是在目前緩慢的旅行速度下，突然佈滿了全英國，全國的人民，以比方來說，將會立刻集合在一起，而且將他們的椅子向都市的火爐靠得更近……。由於距離被消除了，我國的地表範圍會捲縮，直到不比一個大城市大多少（引自 Schivelbusch, 1978: 32）。

同樣地，詩人海因（Heine）記下了他對於連結巴黎和盧昂（Rouen）的鐵路開駛的「可怕預言」：

我們看待事情的方式，我們的觀念，現在會發生多麼大的改變！即使是時間和空間這麼基本的概念，都開始搖擺不定了。空間被鐵路殺死。我覺得所有鄉野的山林好像都在往巴黎逼近。甚至現在，我都可以聞到德國菩提樹的氣味；北海的拍岸碎浪，就在我的門前翻滾（引自 Schivelbusch, 1978: 34）。

德國的劇場導演喬漢·柏林格（Johannes Birringer, 1989:120-38），在當代的情境裡，也記下了類似的震驚感受。當抵達達拉斯（Dallas）和休士頓（Houston）時，他察覺一種「前所未見的空間崩潰」，此處「都市體（社區的實質和文化表徵）的散亂和分解，已經到達一種奇幻的境地」。他評論道：

地理現實無可避免地趨向融合與混亂，一切地方都可以互相交換，可見的（靜態）參照點消失不見，成為恆常變換的表面影像。

他的結論是：休士頓的謎，

乃是社區的謎：朝著所有方向破裂和爆炸……。城市具現了投機的無秩序，那是一種瀕於矛盾的誇張法（全球性的權力 / 地域性的混亂）的正面的非特定性。

我稱這種空間 - 時間面向性難以抵擋的變化為「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以便捕捉海因的預兆感受和柏林格的崩解感受。這種經驗逼迫我們所有人調整空間和時間觀念，並重新思考社會行動的展望。如我已經論證過的，這種重新思考植根在政治 - 經濟的鬥爭裡。但它也是激烈的文化、美學和政治爭辯的焦點。反省這個觀念，有助於我們理解資本主義時代文化和政治生產領域裡發生的某些騷亂。

在彼此差異很大的作家，比如說詹明信（Jameson, 1984）、伯曼（Berman, 1982）和丹尼·貝爾（Daniel Bell, 1976）等人的作品裡，最近稱為「後 - 現代主義」的複雜運動，都與新的空間和時間經驗連結在一起。有趣的是，雖然提出了這個觀念，他們都沒有告訴我們，他們用這個觀念的真正意思是什麼。而且這些新時空經驗所立基的物質基礎，以及它跟資本主義發展的政治經濟關係，依然是被遺留在陰影裡的課題。我特別有興趣要看看，僅僅連結上一九七三年政治經濟危機所引發的新時空經驗，後現代主義能夠被理解多少（Harvey, 1989a）。

那個時候，先進資本主義世界大部份被逼進一場有關生產技術、消費習慣和政治經濟實踐的大革命裡。強大的發明潮流集中焦點在加快和加速的周轉時間上。決策的時間範域（現在已是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分秒必爭）縮短了，而且生活方式的風尚變換迅速。這一切都伴隨了空間關係的激烈重組、空間障礙的進一步消除，以及一個資本主義發展的新地理形勢的浮現。這些事件引發了強烈的時空壓縮的感受，影響了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每個面向。整片的地景必須摧毀，以便騰出空間來創造新地景。在一個從工業生產技術到內城的每件事物的再結構都成為關切的主要課題的時代，創造性的毀滅、漸增的片斷化（fragmentation）、（社區生活、技術、生活方式的）瞬息萬變等主題，在哲學和文學論述裡，都變得更為顯著。邁向後現代主義的移轉所預示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的轉變，似乎和過去二十年所發生的政治 - 經濟實踐的轉變有密切的關係。

回顧過去，想想那被稱為現代主義（被想成是後現代主義所反對的東西）的

複雜的文化運動。一八四八年之後的巴黎，的確在寫作和藝術的再現上發生了一些特別的事，而根據當時的時空裡的政治—經濟的轉變來看這些事，會有所幫助。在一八四八年，海因的模糊預言成爲戲劇性與創傷的經驗，當時的資本主義世界，政治—經濟採取了未曾預見的同時性（*Simultaneity*）。那一年橫掃歐洲各國首都的經濟崩潰和政治革命，點明了資本主義世界是以當時無法想像的方式連結在一起。這種速度和同時性是如此深刻地令人苦惱，因而需要一種新的再現模式，藉以更清楚地理解這個互相關連的世界。現實主義的再現模式，以簡單的敘事結構爲模型，已經無法完成這項工作（無論狄更斯〔*Dickens*〕在像《荒涼山莊》（*Bleak House*）這樣的小說裡，多麼有才華地跨越時空也不行）。

波特萊爾（*Baudelaire, 1981*）接受這個挑戰，將現代主義的疑旨界定爲在一個（空間）片斷化，（時間）瞬息化與創造性的破壞的世界裡，對普遍真理的尋求。福樓拜（*Flaubert*）小說裡的複雜句子結構與馬奈（*Manet*）的筆觸，界定了全新的空間與時間的再現模式，允諾了新的思考方式，以及社會和政治行動的新可能性。肯恩（*Kern, 1983*）對一九一四年（一個在差異很大的領域如物理、文學、繪畫和哲學裡從事實驗的非凡時代）之前不久所發生的時空再現革命的解釋，是迄今最清楚的研究，說明了時空的壓縮如何引發經驗，而且從中擠壓出新的概念。文化領域裡的前衛運動，一方面反映，另一方面也企圖安置新的空間和時間的定義，加諸正處於劇烈轉變高潮的西方資本主義。

仔細檢視內含於這些文化和政治運動裡的矛盾，可以顯示它們如何映照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裡的基本矛盾。想一想對最近的資本周轉時間加快、加速的文化回應。首先，資本的周轉時間的加速，預設了消費習慣和生活方式的更快速轉變，而後者因之成爲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的社會關係的焦點。資本主義對文化生產領域的穿透特別吸引人，因爲比起可以觸摸的物體，如汽車和冰箱，影像消費的壽命幾乎只是一瞬之間。最近幾年，有大量的資本和勞動被運用到這上面。這伴隨了對於製作控制下之奇觀的新強調（洛杉磯奧運是最佳範例），它可以很方便地同時做爲資本積累和社會控制的手段（重振了對於在不安年代裡老舊的羅馬「麵包與馬戲團」公式的政治興趣）。

對於空間障礙崩解的反應，矛盾並沒有比較少。全球的相互關係越緊密，我們的晚餐材料和貨幣流動就越國際化，空間阻礙崩潰地越徹底，世界上的人群就更緊密地連繫於地方和鄰里，或國家、區域、族群團體，或宗教信仰，以之做爲認同的特殊標記。這種對可見且可觸摸的認同標記的需求，在猛烈的時空壓縮裡很容易理解。不論資本主義的回應是發明傳統，以之做爲另一種商品生產和消費的項目（重新施行古代的儀式和景觀，過度繁盛的遺產文化），在一個影像之流加速而且日益與地方無關（除非電視和錄影帶的螢幕可以適當地視爲一個地方）的世界裡，依然有堅決的尋根熱望。社會空間朝著我們內爆的感受所引發的預兆（從日常新聞到隨意的國際恐怖行動或全球環境問題的一切事物，都清楚地標示了這種預感），轉譯成爲認同的危機。我們是誰？我們屬於什麼空間 / 地方？我

是世界的公民，還是國家或地域的成員？如果肯恩（1983）對第一次大戰前的時期的說法是正確的，那麼，在資本主義的歷史裡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空間障礙的消除激發了昇高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和地域主義感受，以及高度的地緣政治的對抗和緊張，這乃是因為空間障礙的阻隔和防禦力量被削弱了。

地方和空間之間明顯緊張關係，呼應了我先前提到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中的基本矛盾；需要有特殊的空間組織，才能取消空間，要有長周轉時間的資本，才能促進其他資本的快速周轉。這種緊張可以從另一個立場來檢視。當今跨國資本對地理形勢少有尊重，因為削弱了空間阻礙，正是開放全世界做為它的獲利場。但是，空間阻礙的減弱也有同樣強大的反面效果；不同地方的性質（它們的勞動力供應、基礎建設和政治的容受度、資源的種類、市場的所在等等）之間小規模的、細微的差異，變得更加重要，因為跨國資本正處於一個能夠更有利地剝削它們的位置。基於相同理由，地方也更加關切它們的「優良經營環境」，而且地方之內的发展競爭也變得更為微妙。社區的形象塑造（巴爾的摩內港的那一種），也牽涉在都市內部的激烈競爭過程裡（Harvey, 1989b）。在一個支配空間的權力（特別是關涉金融和貨幣流動）比以往更加鮮明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裡，對於地方的真實和虛構的特質的關切日益提升。地方的地緣政治變得更加引人注意，而非潛沈。因此，全球化引發了正好相反的運動，邁向地緣政治的對抗和分化為敵對陣營的充滿敵意的世界。全球資本主義裡地緣政治片斷化的威脅——例如歐洲共同市場、北美共同市場，以及日本貿易帝國等地緣政治的權力集團之間的關係——絕非事出無因。

正是由於這些理由，處理資本主義下之時空的歷史地理學才格外有意義。地方和空間、長期和短期時間範域之間的辯證對立，存在於時空面向性轉變的更深層架構裡，這種轉變是加速周轉時間和藉由時間取消空間的資本主義根本律則的產物。研究我們如何對付時空壓縮，顯示了空間和時間經驗的轉變，如何在諸如美學和文化再現的領域裡，引發了新的鬥爭，社會再生產和生產的基本過程，如何深深地根植在轉變中的時空範域裡。就此而論，如果我能暫時離題，我發現一件有趣的事，迄今出自地理學陣營的關於文學和地理學間關係的探究，幾乎沒有例外地集中在對地方的文學召喚上（例見 Mallory & Simpson-Housley），而與空間性（spatiality）有關的更為根本的問題，如福樓拜和喬艾思（Joyce）的小說，則未見提起。我也發覺很奇怪地，在目前的時勢裡，地理學家過度集中在地域性（locality）的重要性上，偏重空間和地方的矛盾動態關係的一方，似乎這兩者是彼此分離而非辯證地相關的概念。

### 與社會和美學理論相關的地理學

以歷史－地理的唯物論所提供的這種認識論和存有論承諾為武裝，我們可以開始闡明空間和時間的理論性與哲學的概念，這些概念（或明或隱地）維持了特定的社會視野和對世界的闡釋。在這麼做的時候，從西方思想中美學和社會理論

之間的重要分別開始考量，會有所幫助。

在亞當·斯密（Adam Smith）、馬克思或韋伯（Weber）等不同的傳統裡所建構的社會理論，在其論證理路中，傾向於將時間置於空間之上，反映且正當化了經由缺乏空間的進步和革命學說的透鏡來觀看世界的作法。最近幾年，許多地理學家已經嘗試修正這種有缺陷的視野，重新引介空間的概念，認為空間不僅對於適當地理解社會過程具有意義，而且是位居核心（參見 Gregory & Urry, 1985; Soja, 1989）。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努力被某些社會理論家認可並加以讚譽，認為空間確實很重要（例見 Giddens, 1984）。但是這項工作只完成了一部份。我們日漸落在商品拜物教之後，這警告我們，要將時空的歷史地理學，整合到我們對於人類社會如何被建構和變遷的全部理解的架構裡。藉由這個主題的探究，我們地理學家對社會理論的介入更站得住腳，雖然這總是預設了地理學家的訓練要包含對社會理論的掌握，而且在知識上要接受挑戰，探究社會和空間與時間的社會建構之間艱險的界面領域。

但是，很奇怪地，還有另一個理論介入的領域，依然大部份未見探究，只有以令人不滿且不完整的方式，暗地輕咬，而非和明顯的問題鬥爭。我在這裡所提的是地理學作品和美學理論之間的疊合。後者正好和社會理論相反，強烈地關切「時間的空間化」，雖然討論的重點是這種經驗如何傳達給有知有感的個人並且接受它。舉最明顯的例子，建築師企圖藉由空間形式的建造，來傳達某種價值。卡斯騰·哈里斯（Karsten Harries, 1982）主張，建築不僅僅是定居在空間裡，從空無的空間中拉扯、塑造出一個生活的地方。它也是對於「時間的恐怖」的一項深刻抵拒。「美的語言」乃是「永恆現實的語言」。創造一個美的物體乃是「連結時間與永恆」，並據此將我們由時間的暴虐中救贖出來。空間構造物的目的「不是闡明時間的實體，使我們或許可以更適意地悠游其中，而是……在時間中廢除時間，即使是只是暫時的」。布迪厄（1977: 156）認為即使是書寫，也將實踐和論述扯離了時間之流。

當然，像社會理論一樣，有各式各樣的美學理論（例見 Eagleton[1990]對這個主題的精妙論著）。但是我引用哈里斯的這些評論，用意是要說明美學理論緊抓的一個核心主題：在一個快速流動和變遷的世界裡，空間構造物如何被創造和利用做為人類記憶和社會價值的固定標記。關於不同形式的生產出來的空間，如何抑制或促進了社會變遷的過程，我們可以從美學理論學到很多。有趣的是現在地理學家的努力從文學理論家（Jameson, 1984 和 Ross, 1988）那邊獲得的支持，比從社會理論家那裡來得多。相反地，關於美學理論必須對待的流動與變遷，從社會理論中可以學到很多。由於歷史地理學位居這兩個向度的交點上，因此它有巨大的潛力可以對兩者的理解有所貢獻。藉著使兩種思潮互相抗衡，從中獲利，我們甚至有希望創造一個更一般性的理論架構，用以詮釋空間與時間的歷史地理學，同時可以理解文化和美學的實踐——空間化——如何介入社會和政治變遷的政治－經濟動態。

讓我說明這種論調的政治意涵在哪裡。美學的判斷（以及附著其上的「救贖的」藝術實踐）經常成為政治和社會行動的有力判準。康德（Kant）認為獨立的美學判斷，可以做為客觀科學的世界和主觀的道德判斷之間的中介。如果美學判斷賦予空間相對於時間的優越性，那麼，在某些狀況裡，空間的實踐和概念就能夠成為社會行動的核心。

就此而論，德國哲學家海德格（Heidegger）是一個有趣的人物。拒絕了康德主體和客體的二元對立，而且避免落入尼采思想似乎會導向的虛無主義，他宣稱存有（Being）的永恆性超出流變（Becoming）的暫時性，而且他歸向了真正的美學政治國家的傳統主義視野（Chytry, 1989）。他的探索引領他遠離現代主義和猶太—基督教思想的世界，而回到前蘇格拉底（Socrates）的希臘思想裡熱烈的和創造性的國族主義。他宣稱（Heidegger, 1959）所有的形上學和哲學，只有在關連到民族的命運時，才有意義。德國在兩次大戰間的地緣政治位置，被擠壓在美國和蘇俄之間的「大鉗子」裡，威脅了對這種意義的尋求。他寫道「如果有關歐洲的重大決定，不是要導向毀滅」，德國「必須將自己，並且連帶地將西方歷史移出它們未來『事件』的核心，進入存有之權力的原初領域」，而且「這個決定，必須以歷史性地由中心開展出來的新精神活力的觀點來制定」。對海德格而言，此處蘊藏了「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內在真理和偉大」（Blitz, 1981: 217）。身為這樣一個偉大的二十世紀哲學家，他曾經偶然地引發了卡斯騰·哈里斯和大部份有關地方意義的地理學著作的哲學化（參見 Relph, 1976; Seamon & Mugerauer, 1989），卻會在政治上和納粹如此妥協，並將自己的命運交予納粹，實在是令人難以理解。但是從我現在的論證所處的立場，可以提出一些有用的論點。海德格的著作深深地浸透著美學的感受，將存有和地方的特殊性質，置於流變以及普遍空間裡現代主義式進步的普遍命題之上。他完全拒斥了猶太—基督教的價值、機械理性的神話，以及國際主義。他所採取的位置是積極且具革命性的，因為他見到了救贖實踐的必要性，這在實際上有賴於恢復（關於血統和土地、種族和祖國、命運和地方）神話的權力，動員一切社會進步的裝備，投入崇高的國家成就之計劃。將這種特殊的美學感受運用在政治上，有助於激烈地改變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形勢。

我幾乎不必提醒地理學家，二十世紀地理學의 思考和實踐的歷史是多麼艱辛，而地理學家在遭遇牽涉其中的棘手議題時是多麼困難。我注意到哈茲宏（Hartshorne, 1939）的《地理學的性質》在德奧合併（Anschluss）後不久寫於維也納，書中完全拒絕了地理學裡的美學，而且將最尖酸的責難留給景觀地理學的神話。跟隨赫特納（Hettner）的論點，哈茲宏似乎想要排除任何將學院地理學政治化的機會，當時地理學裡充滿了政治，而且地方和美學的情感正依據納粹的目標積極地動員。當然，困難在於逃避問題不等於解決問題，即使是學院地理學也是如此。

這並不是說在哈茲宏之後，任何想要在地理學裡恢復美學的面向的人都是潛

在的納粹，因為如伊格頓（Eagleton, 1990:28）所指出的，美學一直是「一個矛盾的、雙刃的概念」。一方面，「它扮演了真正的解放力量的角色——如同一個由感覺的動力和同志情誼連結的主體所形成的社區」；然而，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將壓制內化，「將社會權力置入其屬民身體的更深處，而成爲一種最爲有效的政治霸權模式」。由於這個理由，政治的美學化有長遠的歷史，在社會進程上同時提出了問題與潛能。這個議題有左派和右派的版本（畢竟，聖狄尼斯塔斯〔Sandinistas〕將環繞著聖狄諾〔Sandino〕這個人物的政治美學化了，而馬克思的作品充滿了對一個解放創造性感受的潛在計劃的指涉）。這個問題最清楚的形式，乃是把強調的重點從歷史進步及其意識形態，轉移到促進國家（甚或地域）的命運和文化的實踐上，而這通常在世界經濟裡引燃了地緣政治上的衝突。在地緣政治學的歷史裡，對於地方、民族和傳統，以及美學感受的神話的訴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認爲這裡蘊涵了將美學和社會理論的觀點融匯一起的重要意義，將空間置於時間之上和時間置於空間之上這兩種理解方式扣連起來。一般的歷史地理學，以及對於時空的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正好落在兩者的交點之上，因此，它們在理解人類社會如何運作上，扮演了知識、理論、政治和實踐各方面的角色。將地理學的研究擺放在空間和時間之間，我們顯然還有很多要學，也有很多可以貢獻之處。

### 地理學的想像

我的結論要做個簡短評論，焦點在於上述觀點對地理學研究，以及對在學院分工裡佔有一個標明爲「地理學家」地盤的相當小的學者群體的意涵。

學院分工是十九世紀後期的狀況和關心的事物的產物。當時學科界線的劃設（以及後來由於專業化和制度化而僵化），絕對不會合於目前的狀況和需要。部份是爲了回應這個問題，學院裡學科內的勞動分工日益片斷化，從縫隙中冒生出許多新學科，尋求主題之間的交叉連結。這段歷史和外在大社會的勞動分工發展一樣。工作日益專門化、產品多樣化、生產過程間接化，大型跨國公司的特徵像大型大學一樣，尋求水平連繫。在地理學裡，這個片斷化的過程從一九六〇年代中期起加速進行。其結果是越來越難辨明「學科」一詞所表示的結合邏輯。

學院裡，觀念的周轉時間也加速了。不久以前，一生出版兩本書以上就被認爲野心太大。現在，領袖群倫的學界人士必須每兩年出版一本書，證明自己還活著。學院裡生產力和產出的界定越來越嚴格，學術成就也越來越僅以這些項目來衡量。當然，在研究和企業／國家的要求之間，在學院和出版界，以及做爲先進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成長部門的教育之間，有某些重疊。觀念生產的加速，平行於資本主義整體的加速周轉時間的一般性推力。但是書籍和期刊的更大產量，有賴於新知識的生產，而這意味著更爲激烈地互相競爭，以尋找新觀念，並且對於

這些觀念的所有權更感興趣。只有當亞當·史密斯的看不見的手，在其他市場無法發揮的一切效果都在學院裡實現了，這種瘋狂的活動才能夠凝聚成爲某些具有共識，而且基礎穩固的「真理」。實際上，觀念、理論、模型、主題辯論，是一種本月流行色彩式的時尚，它們加劇了快速周轉、加速和瞬息萬變的狀況。去年是實證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今年是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ism），下一年是實在論，後年則是建構主義、後現代主義或其他什麼東西。跟緊班尼頓（Benetton）色彩變化的步調，比追隨當前學院世界裡短暫觀念的迴轉要容易多了。

即使我們爲這種後果嘆息，也很難看出我們能怎麼抵擋這個趨勢。我們的職業說明，並未包括「做爲知識份子的地理學家」，而是十分典型地載明更爲狹窄的各種專業，從只是技術的運用（遙測和地理資訊系統），到運輸模型、工業區位、地下水模型、蘇聯地理學的專家，或是當月的風行話題（永續發展、混沌理論、碎形幾何或其他）。我們所能做的頂多是指派專家，然後期待他們對整個學科有興趣。我們表面上的不能或不願抵抗片斷化和瞬息化，間接地表明了有一種狀況，在其中超出我們控制的力量正加諸我們身上。比如說，我希望那些現在大聲宣稱個人的作用在人類事務中有權力的人，能夠展示他們或我們的特定作用，如何製造了工作和生活狀況的鉅大變化。我們只是社會過程的受害者，而非其真實的本源嗎？如果在此我也傾向於馬克思主義的概念，認爲個人在不是他們創造的歷史條件裡，勉力鬥爭以開創歷史，那是因爲我們大多數人的人生只有那一種經驗。

當我們思及對於美學、景觀地理學和地方的興趣復燃，成爲許多人文地理學家的關切重心，同樣的問題又浮現在心。那種認爲要確保地理學在學院中的地位，就要以地方概念（即使是理解成一種獨特的要素之形貌）爲學科核心的宣稱，在當前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裡更爲興盛。在這個階段裡，一個地方的特殊性質對跨國資本更形重要，同時對於在強大的時空壓縮的情況下，地方的政治與意象做爲假定的（甚至是虛構的）穩定性的競技場的興趣也復起。對於地方的認同與根源的社會研究，再次進入地理學，成爲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而且在一個快速變遷的世界裡，逐漸被用來賦予這門學科一個更強大（但同樣虛假）的認同。

對空間和時間的歷史地理學有了深刻理解後，對這門學科爲何在此時此地致力於這些研究領域的疑問，可以有相當多的提示。它提供了一個批判觀點，由此可以評估我們對充滿我們生活周遭的社會壓力的反應。不經思考地接受地方對我們這門學科的重要意義，我們是否會因此冒險，漸漸轉向無意識地支持美學化的地緣政治學的重現？這個疑問並非暗示要逃避那個議題，而是藉由一種位居社會理論和美學理論交點的地理學概念，妥當地面對它。

空間與時間的歷史地理學，促使我們批判地反省我們是誰，以及我們爲之奮鬥的是什麼？我們試圖建立的空間和時間概念是什麼？這些如何與資本主義下變化多端的時空的歷史地理發生關連？一個社會主義的或對生態負責的社會的空間和時間，看起來像什麼樣子？地理學家畢竟對關於空間性及其意義的問題多

所貢獻(而且具有潛在的權力和重要性)。由於同時對空間和時間有潛在的興趣，歷史地理學家具有無限的潛能，來反省不僅是這個或那個地方的歷史和空間關係，而是整個社會生活與社會再生產變化中的時空經驗之謎。

批判地反省空間與時間的歷史地理學，會將空間與時間觀念的歷史擺置在它們的物質、社會和政治的場景中。哈茲宏並非在政治真空之中寫就《地理學的性質》，而是在德奧合併之後的維也納，這個事實(雖然在那本著作中從未提及)確實在他建構和介入觀念世界的方式裡出現。我的這篇文章同樣也是在某種時空壓縮經驗、在社會再生產和政治論調的大幅變動之中組構起來的。即使是偉大的康德，他的空間和時間概念，他的美學、道德和科學判斷之間的區分，也不是在社會真空中發展出來的。他的宏偉企圖乃是整理和組合內含在資產階級的啓蒙理性邏輯中的明顯矛盾，當時這個矛盾已在十八世紀末橫掃歐洲的革命浪潮中展開。康德的作品是這個社會非常特殊的產物，這個社會具有以理性和數學般的精確來控制空間和時間的特殊和實際偏好，同時又經驗了發動這種理性秩序的新生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一切挫折與矛盾。如果黑格爾攻擊康德(從他的美學到歷史理論的每件事)，而馬克思攻擊黑格爾和康德(也是從美學到物質性和歷史等基本概念的每件事)，那麼這些爭論都和重新界定社會變遷路徑的企圖有關。如果我身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依然不放手對有秩序的社會革命的追尋，期待這個革命讓我們脫離資本主義的矛盾、明顯的不正義，和無動於衷的「為積累而積累」的邏輯，那麼這會使我投入一場重新界定空間和時間意義的鬥爭中，做為這種追尋的主要部份。如果我仍然還是在新康德主義(我不得不說，大部份人還不知道這回事)佔優勢的學院中的少數份子，這種情形只不過驗證了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固執，以及從中引申出來的資產階級觀念，包括那些界定與客觀化空間與時間的觀念，依然持續存在。

執守某種空間和時間概念，乃是一項政治決定，而時空的歷史地理學揭露了這種情形。身為專業的地理學家，我們要推動哪一種空間和時間？這些概念微妙但堅定地指涉的社會再生產過程是什麼？當前推動地理教育的運動呼聲很大，但是我們所教的是什麼樣子的語言？我們只是堅持學生應該知道查德(Chad)有多少鄰國嗎？我們應該教托勒密系統的靜態理性，堅稱地理學只不過是地理資訊系統，是哈茲宏的法則——只要是可畫成地圖的都是地理學——的現代版本嗎？或者，我們應該教商品的豐富語言，教從我們的餐桌一直往前延伸到現代世界中幾乎每一個勞動地點的社會與空間關係的錯綜複雜歷史？我們接下來能夠教不均的地理發展、環境轉變(去森林化、土壤貧瘠化、水文變化、氣候變化)豐富且複雜的語言嗎？這些議題的歷史地理學的重新建構才剛剛起步。我們是否能夠走得更遠，培養一種深刻的敏感，察覺社會過程在政治爭論中為何可以被賦予美學的形式(而且學到如何辨別潛伏其中的所有危險)？我們是否能夠環繞著一個在時空的歷史地理學裡，融合了環境、空間和社會的計劃，建立一種新的語言，甚至全新的學科？

這一切可能都有待探索。但是無論我們採取什麼課程，根據我們願意推廣什麼樣的空間和時間，就引申了什麼樣的政治承諾。我們是政治的作用者，我們必須明白這一點。政治是日常生活的問題。一個美國在歐洲的傳播公司的行銷首腦（*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9 March 1989），在和資深的銀行家談話時，想要脫離氣象紀錄上最溫暖的一月的嘲虐話題，很嚴肅地談到了全球溫室效應的長期趨勢。他的主顧的反應方式，都表明了他們思考環境的方式「就和我們在舒適的家裡從事嗜好活動一樣」，而且是在周末，而我們則一直都認真地在思考這些問題，「尤其是在工作的時候」。但是國際銀行家的時間範域以分秒計，他們怎麼會想到這些事情呢？如果在金融市場二十四小時是很長的時間，而且如果金融資本是當今國際發展上最強大的力量，那麼，我們怎能期待甚至從長期投資的觀點看，這個部門能做出什麼樣的長期決策呢，更別提環境的調適了。當文森號（*Vincennes*）的指揮官要做一個攸關生死的決策，決定出現在螢幕上的影像是俯衝的戰鬥機、還是一架伊朗空中巴士時，他正被時空壓縮的恐怖擄獲，這種時空壓縮最終將一切事物解離成爲瞬間和片斷，惡魔所捕捉的不是藏在最後面的，而是全球整體，是一個比以前更緊密連結的國際化社會的整個社會織理，其中的變化步調突然加速了。

地理學家無法逃避這些時間的恐怖。我們也無法避免在廣義上成爲歷史的犧牲者（而非其勝利者）。雖然身處永遠不是我們自己創造的狀況，但是我們一定可以爲一個不一樣的社會視野和不一樣的未來奮鬥，有意識地警覺我們的利害關係和目標。我相信，藉著將地理學擺置在空間和時間之間，視我們自己爲時空之歷史地理學的積極參與者，我們可以替自己重獲一些比較清晰的目標感，界定一個嚴肅的知識辯論和探問的競技場，並且在一個深陷混亂的世界裡，於知識上和政治上做出重要貢獻。

#### 謝 辭

我要感謝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對於演說稿和本文的草稿的建設性意見。傑克·蘭頓（Jack Langton）也曾給我有用的意見。

#### 參考文獻

- Baudelaire, C. 1981. *Selected writings on art and art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ll, D. 197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 Berman, M. 1982.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Birringer, J. 1989. Invisible cities/transcultural images. *Performing Arts Journal* 12:33-34, 120-38.

- Blitz, M. 1981.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The possibilit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ytry, J. 1989. *The aesthetic state: A quest in modern German though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ebord, G. 1983.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etroit: Black and Red Books.
- Durkheim, E. 191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Eagleton, T. 1990.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Forman, F. J., with Sowton, C., eds. 1989. *Taking our tim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emporality*. Oxford: Pergamon Press.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xford: Polity Press.
- Gregory, D., and Urry, J., eds. 1985.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London: Macmillan.
- Hall, E. T. 1966. *The hidden dimens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Hallowell, A. 1955. *Cultural and experien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Hareven, T. 1982. *Building and the terror of time*. *Perspecta: The Yale Architectural Journal* 19; 59-69.
- Hartshorne, R. 1939.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Lancaster, PA: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 Harvey, D. 1982. *The limits to capit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_\_\_\_\_. 1985.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89a.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 \_\_\_\_\_. 1989b. 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governance in late capitalism. *Geografiska Annaler* 71(Series B):3-17.
- Heidegger, M. 1959. *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elgerson, R. 1986. The land speaks: Cartography, Chorography, and subversion in Renaissance England. *Representations* 16:51-85.

- Jameson, F. 1984.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46:53-92.
- Kerns, S. 1983.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 Landes, D. 1983. *Revolution in time: Clock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efevre, H. 1974.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aris: Anthropos.
- Le Goff, J. 1980. *Time, Work and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_\_\_\_\_. 1988. *Medieval civilisa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Levine, M. 1987. Downtown redevelopment as an urban growth strategy: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the Baltimore renaissance.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9(2):103-23.
- Lévi-Strauss, C. 1963.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Mallory, W. F. and Simpson-Housley, P., eds. 1987. *Geography and literature: A meeting of the disciplines*.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Marx, K. 1967. *Capital, Volume 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McLuhan, M. 1966.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McGraw-Hill.
- Mitchell, T. 1988. *Colonising Egyp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B. 1986. *Space, text and gen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arce, D.; Markandya, A.; and Barbier, E. 1989. *Blueprint for a green economy*. London: Earthscan Publications.
- Relph, E. 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 Ross, K. 1988.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space: Rimbaud and the commun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ack, R. 1986. *Human territoriality: Its theory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id, E.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 Schivelbusch, W. 1978. *Railroad space and railroad time*. *New German Critique* 14:31-40.
- Seamon, D., and Mugerauer, R., eds. 1989. *Dwelling, place and environ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N. 1984.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Soja, E. 1989. *Postmodern geographies*. London: Pluto.
- Stone, J. 1988. Imperialism, colonialism and cartography. *Transactions,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 13, No.1, 57-64.
- Szanton, P. 1986. *Baltimore 2000*. Baltimore: Goldseker Foundation.
- Toffler, A. 1970. *Future shock*. New York: Bodley Head.
- Tuan, Yi-Fu. 1977. *Space and pla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